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近些年來，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繁榮發展，傲人的經濟改革發展成就舉世矚目，但在繁榮的背後潛伏著許多社會問題，人口問題是其中相當重要的熱點問題之一。¹中國大陸自五十年代開始提出、六十年代在城市和少數農村推行、七十年代逐步在全國範圍推行計劃生育政策，計劃生育政策也就相應地從無到有、從不完善到相對完善，逐步形成法律規範。

早期，從毛澤東關於人口問題的講話，可以明顯地看出至少在一九五八年的時候他是要求增加人口數量的。當然，他認為最終還是要講節育，要實行有控制的計劃生育政策。毛澤東時期雖然主張增加人口數量，但他在某種程度上並不排斥控制人口數量，並主張提高人口身體和文化素質，調節人口年齡、性別、城鄉、地區分佈等結構等。另一方面，在怎樣開展計劃生育的設想中，毛澤東已經提出了進行性教育的主張。在人口問題上，毛澤東一貫強調要解放思想，破除對專家的迷信，要樂觀同時要控制。²

一九七二年，中國國務院提出：「實行計劃生育，要視人口增長與國民經濟發展相適應。」要求各地「把計劃生育作為縣級領導的一項中心工作，與生產任務緊密結合」，做到「計劃生育在領導思想中有位置，制訂生產的指標、檢察總籍工作有計劃生育的內容」。將計劃生育視為進一步提高生產力的發展策略，以明確計劃生育工作的目的，³這開始成

¹ 田雪原，《大國之難》，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頁3。

² 常崇？編，《當代中國的計劃生育事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頁66。

³ 常崇？編，前揭書，頁68。

為中國政府大力推行具有中國特色的計劃生育政策。計劃生育政策在執行面上益趨嚴格，以至於到一九八一年九月起在全國範圍大力提倡和推行「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的獨生子女「一胎化」政策。現在中國全境人口總數經過三十餘年的計劃生育調節下，平均年生育率水準已經降到了更替水準以下，人口數量目前是處在一種低速的慣性增長階段。⁴

中共人口政策在壓制人口增長方面或有成就，「一胎化」政策並且成為中國大陸人口政策的主軸，但吾人不難看出許多依舊潛在的問題。例如因為傳統重男輕女的觀念而引起的溺殺女嬰及人工墮胎、人口老齡化以及性別比不均衡等社會問題，性別比例長期失衡的結果更非短期間內可以解決的。

逐漸浮現的社會問題與早期人口政策不連貫、朝令夕改等因素相關，再加上過去中國大陸缺乏完備健全的政策體系，使得改革開放後中共中央制定人口政策上為了確保經濟發展及社會安定，而具有相當程度的強制性與欠缺人道關懷。中共人口政策不斷地進行調整，國家並動用大量人財物力和社會、經濟、行政手段以推行計劃生育，是現階段具有中國特色的人口政策，迥異於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口政策。

隨著九十年代中國大陸人口政策的進一步調整，中共從一九九七年開始部分修正人口政策，即在全國六四個城市裡，若是夫妻雙方都是原生家庭的獨生子女，則允許生育兩個孩子。⁵中國政府基本主張一個家庭只生一個孩子，目前中國社會已進入所謂「小皇帝時代」，⁶類似的各層面問題將是中國難以迴避的嚴峻課題。

中共的政策制定者僅從宏觀的角度去思考、制定、並執行人口政策，而欠缺思考以「客觀分析」取代「主觀分析」，即處於生育主體（人

⁴ 本刊編輯部，「中國人口數量：究竟多少億才合適？」，《人口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2002年第26卷，頁47。

⁵ 李芽聆，《現代中國的人口政策》，漢城：漢城女子大學，2000年，頁10。

⁶ 李徑宇，「獨生入世」，《中國新聞週刊》，2003年9月30日，頁7-8。

民)自身立場之外作分析，並沒有設身處地站在生育主體的立場上，去理解人民對於生兒育女的內在需求。當我們較為全面地瞭解到生育主體的行為動機，或者說生養多個孩子的效用的這個驅動力，我們就有必要思考我們的既有理論，嘗試將理論的探究結合到人口政策的思考中去，使人口的控制政策能夠更貼近群眾的生活，從而獲取進一步實施的微觀基礎。

目前許多學者對於人口性別比例失調問題、老齡化問題、獨生子女問題等已有深入研究，並提出許多政策建議與具體主張，但他們只是獨立的看待這些問題，在聯繫工作上較為欠缺，其實人口政策所引起的許多問題都可以歸結到獨生子女這一問題的分析上。另外，現有理論在利用調查研究所提供的資料方面並不充分，沒有深入的將現有資料與理論假設很好的結合起來，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理論的可靠性及透徹性。本文就試圖從此處著手，儘量利用已有的資料，將統計資料與所要分析的問題很緊密的結合起來。

另外，獨生子女問題又是重中之重，無論性別比例失調問題還是人口老齡化問題，都將對獨生子女的發展產生深刻的影響，這就引出本文試圖分析的獨生子女問題。本研究即緣起於這樣的背景下，希望在探討中國大陸人口政策方面，突出中共當局所面臨的問題與困境，並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議，希冀於中國大陸人口問題研究上能貢獻一己之力。

二、研究目的

目前人類面臨的無數現代文明問題當中，人口數量激增堪稱是最嚴重的問題之一。隨著人口增長，開發中國家的人口數量占全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以上，因而導致全球性的許多問題產生。包括中國大陸在內，自一九五三年第一次人口普查開始到二〇〇〇年的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

的 47 年裡，隨著人口的急速增加，產生問題重重。⁷

目前中國人口總量仍然以每年一千萬以上的速度增加。⁸隨著這樣的幾何級數的人口增加速度而產生的許多副作用對各方面均引起負面影響。因此中共自五十年代開始到目前全面施行的計劃生育作為人口政策，同時採取人口教育制度以及通過法律的制定、實行和改善等展開人口抑制政策。

本研究將評估過去中共人口政策的演變，以及對各方面的正負面影響。過去中共的人口政策大體上可以說是成功，但總人數的增加且從之衍生的許多副作用是非常嚴重的問題。由於深感人口問題影響的深遠，筆者試圖通過對人口問題的深入探討，力求找到問題存在的癥結，當然，當前人口理論的相對詳實也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探究空間，有著相當重要的啟示，進而能夠總結經驗與社會實際狀況，根據中國國情正確認識中國的人口問題，以求走出理論研究誤區，希望能對其中國社會現代化的良性發展做出一定的助益。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文試圖將定性與定量分析方法相結合，即在論述歷史實際情況的過程中將當時的人口思想反映出來；強調大量運用歷史上人口方面的資料，通過圖表，更清晰的將當時的人口思想表述出來。由於中國現代人口資料比較翔實，故筆者準備在回顧中共建政以來的人口政策演變過程中，主要運用文獻分析法，儘量運用圖表分析問題，充分運用當時的資料，使人可以更清晰的把握到當時政策的演進歷程。

在運用文獻分析的過程中，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進行：首先，以

⁷ 李芽聆，《現代中國的人口政策》，漢城：漢城女子大學，2000年，頁2。

⁸ 翟振武，「中國人口規模與年齡結構矛盾分析」，《人口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2001年第25卷，頁1。

歷史研究法來分析中國人口政策的演進，這裡吾人劃分為三大階段就各時期：第一階段為鼓勵生育政策階段，即 1949~1953 年的鼓勵生育政策時期。第二階段為政策轉變醞釀階段，即 1954~1957 年的政策轉變醞釀時期，1958~1959 年的上層思想繁複時期。第三階段為實施限制生育政策階段，詳細分為 1960~1966 年的確定限制生育政策並開展工作時期，1966~1969 年的喪失政策實施環境時期，1970~1980 年的初秋的全面推行限制生育政策、晚稀少時期，1980 年秋~1984 年春的晚稀少調整為晚一孩政策時期，1984 年春~1991 年的完善生育政策、形成地方計畫生育條例時期，1991 年~現行計劃生育政策的穩定時期。

最後按人口政策工作的成因、目標、手段、影響加以分析，再對其作一檢討及未來發展的評估。通過對各種既存史料、官方檔、報紙、期刊、學術著作等資料的研讀，來分析中國大陸人口政策之演變及其正反面影響，再藉由政策學、人口學理論結構進行分析，就筆者能力所及儘量搜集、分析，就有關的資料加以深入閱讀、參考、探究與引用，來尋求解決中國人口問題之道。

另外，本論文在對中外文獻資料綜述的基礎上，對所要分析的問題進行適當的定義、度量，把握住政策的影響因素及政策與問題之間的因果關係。總結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並在相互比較中深化認識。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大陸人口問題牽涉甚廣，本文僅就其中選擇「一胎化政策」作為研究主題。至於研究時間上的限制，本文從中共建政後至今作為段落。追溯一胎化的趨勢緣由，故本文將大陸人口發展概況及制約其發展的「中共人口政策」亦包括在內。有關人口問題，對於數字統計概念頗為需要，筆者受這方面之訓練少，在人口推算、預估方面，可能呈現不圓滿之處。不僅如此，由於筆者能力有限，對史料的分析尚嫌不到位，必定會給本

論文的論證帶來一定缺陷。至於對西方文獻的探究，由於史料的欠缺及本人語言能力水準尚有一定局限，故在這部分的分析不是太過深刻，有待深入探討。

第四節 人口理論簡介

一、 人口理論 (Population theory)

1) Malthus 的人口理論

Malthus 的人口論在「無所妨礙」前提下提出兩項觀點，分別是糧食為人民生存所必須的物品及兩性間之情慾無法避免。馬爾薩斯的推論以「兩個公理」為前提：「第一，食物為人類生存所必需。第二，兩性間的情慾是必然的」；⁹它們是所謂人類「本性的固定法則」。換言之，Malthus 把食和性看成是有人的本性產生的超社會的自然現象，從而把人口增殖看作自然現象。進而他斷言：「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產人類生活資料力，是無限的較為巨大」。¹⁰於是他拋出所謂兩個級數的理論：「人口，在無所妨礙時，以幾何級數率增加。生活資料，只以算數級數率增加」。¹¹在他看來，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產力是不平衡的，而結果則必須保持平衡。基於上述論斷，他提出了三個命題：「人口增加，必須受生活資料的限制；生活資料增加，人口必增加；佔優勢的人口增加力，為貧窮及罪惡所仰壓，致使現實人口得與生活資料相平衡」。¹²這樣，他便把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工人失業、貧窮等現象，看成是人口增殖過多的必然結果，並且是限制人口過多所必需的。因此他反對濟貧等社會福利政策，認為這不利於限制工人人口增殖，反而會使失業和貧窮現象更嚴重。他主張對人口增殖加以抑制，把貧困、罪惡、瘟疫和戰爭等都看

⁹ 馬爾薩斯，《人口論》，台北：三民出版社，1966年版，頁4。

¹⁰ 馬爾薩斯，前揭書，頁5。

¹¹ 同前註。

¹² 馬爾薩斯，前揭書，頁43。

成是「積極抑制」人口增長的手段。甚至提出所謂「道德的抑制」以迫使窮人不結婚、不生育。

馬寅初（1979）指出，Malthus的這種主張受到許多人的質疑與批評，馬爾薩斯的用戰爭、瘟疫等手段來抑制人口的理論是反動的，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的出發點是維護資產階級和它的政府。

王建康、萬高潮（1997），從兩方面評價Malthus的人口理論，既一方面是所謂兩種比率，另一方面是所謂兩種抑制。認為其實質並非認定人口按幾何級數而食物按算術級數增長是所謂「規律」；而其所謂兩種抑制說，也並非是主張以「罪惡和貧困」來消滅人口。並強調，作為計劃生育運動的理論先驅，馬爾薩斯主張用晚婚、節育等道德手段來抑制人口，決非如批判者們所斷言的那樣，僅僅是將其「作為戰爭、瘟疫、繁重勞動、貧困和饑荒等所謂決定性因素的補充」，相反，他堅信「只有對人口增長的預防性抑制能取代巨大的苦難和大量的死亡」，並指出「當把道德抑制應用在我們現在探討的問題時，可以給道德抑制下一個定義，就是出於謹慎考慮，在一定時間內或長久地不結婚，並在獨身期間性行為嚴格遵守道德規範。這是使人口同生活資料保持相適應並且完全符合道德和幸福要求的唯一方法」。

2）馬寅初人口思想

中國現代人口思想中，最具代表性的當推馬寅初的新人口論。一九五三年中國第一次進行全國人口普查時，馬寅初認為普查的數字在當時是正確的，但缺乏「動態的人口紀錄」，拿「靜態的紀錄」來解釋以後四年的情況，恐怕有出入¹³。他還指出，同國民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一系列矛盾。其中，「我國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資金積累得似乎太慢」¹⁴。

¹³ 馬寅初，《新人口論》，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1999年，頁2。

¹⁴ 馬寅初，前揭書，第3頁。

馬寅初為解決中國人口問題提出一些觀點和主張，主要是下面三點建議：

首先，是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三年再進行一次人口普查，以便瞭解在五年或十年中人口增長的實際情況，認真進行人口動態統計，在這個基礎上確定人口政策，把人口增長的數字納入第二個、第三個五年計劃之內，使計畫的準確性逐步提高。其次，大力宣傳以破除「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五世其昌」等封建傳統觀念；待到宣傳工作達到一定效果以後，再行修改婚姻法，施行晚婚，大概男子 25 歲、女子 23 歲結婚是比較適當的。最後以更嚴厲有效的行政力量補之，主張生兩個孩子的有獎，生三個孩子的要徵稅，生四個孩子的要重稅，以徵得來的稅金作獎金。並且在節育的具體辦法上，主張避孕，反對人工流產。¹⁵

若林敬子（1996）認為馬寅初的觀點與馬爾薩斯有所不同，主要體現在下面的內容中。馬寅初指出人口按幾何級數增長、生活資料按算術級數增長的理論是錯誤的，馬爾薩斯的用戰爭、瘟疫等手段來抑制人口的理論是反動的。新人口論不同於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的出發點是維護資產階級和它的政府；新人口論是為人民，「為了我國人民的政府，是要我們人民生活得幸福，讓國家更繁榮」。¹⁶馬寅初是為了提高農民的勞動生產率，並且提高他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準。馬寅初的理論是為了代表農民的利益而主張，馬爾薩斯是為了維護資產階級的統治，反對從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方面尋找貧困和罪惡的原因，論證私有制是限制人口增長的最有效方法。其次，兩者在控制人口的方法上完全不同。馬寅初是建議通過避孕的方法把沒有出生的人口控制起來。馬爾薩斯是主張用瘟疫、疾病、貧困、罪惡、戰爭等殘酷手段

¹⁵ 馬寅初，前揭書，第 4-6 頁。

¹⁶ 若林敬子，《中國人口問題》，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 年，頁 34-46。

控制人口。方法上馬寅初不同於馬爾薩斯的主張。¹⁷

付尚吉(1994)認為,馬寅初的這些主張,無論就當時或現在來看,都是正確的。正如江澤民在黨中央、國務院召開的計劃生育工作座談會上所強調的那樣:「我國人力資源豐富,這固然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條件,但人口多、增長快,也始終是我們一個沉重的負擔,它嚴重的制約著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進程,影響著人民生活水準和全民族素質的提高。」¹⁸中國人口還持續的增加,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的矛盾仍將突出。人口已經是影響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了。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控制人口增長是正確的。

二、 人口轉型理論 (Demographic transition)

所謂的「人口轉型」,係探究人口自然增加率中自高出生率與高死亡率均衡狀態轉變為低出生率與低死亡率均衡狀態的過程,以西歐人口出生和死亡率的歷史資料為依據,對人口發展不同階段做出描述性說明的理論。他是當前風行與西方的一種人口理論,其基本觀點認為,人口過程不是一個獨立自行運動的過程,而是與社會經濟條件變化密切相關的過程。¹⁹

美國人口學家諾特斯坦(Frank W. Notestein)在 1945 年完整地表述了這一理論。一般說來人口轉變理論包括三個有機的組成部分:第一、對生育與死亡水準的長期變動趨勢的描述,第二、對這些變動的原因所做的理論解釋,第三、對未來人口變動的預測。²⁰人口學家 Blacker(1947)將人口的轉型過程分為五階段:第一階段為靜止階段,此階段的人口型

¹⁷ 同上註。

¹⁸ 付尚吉,「對馬寅初新人口論的再認識」,《學術交流》,哈爾濱:學術交流雜誌社,1994 第四期,頁 45。

¹⁹ 劉錚,《人口學辭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頁 147。

²⁰ 彭喜哲,《傳統變革與挑戰 - 給個開放後的中國農村人口問題》,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2 年,頁 3。

態為高出生率與高死亡率；第二階段為早期擴張型，雖仍呈現高出生率與高死亡率，但死亡率已逐漸下降；第三階段為晚期擴張階段，出生率與死亡率都已逐漸下降，但死亡率下降的情形更為明顯；第四階段呈現靜止情形，為低度靜止階段，呈現低出生率與低死亡率；第五階段為衰退階段，出生率與死亡率皆低，但出生率相較於死亡率更低，人口呈現負成長。（蔡宏進、廖正宏，1987）

A. J. Coale 和 Edgar Hoover 則依照目前工業化國家之經濟發展情形來解釋人口轉變的過程。在以農為主，經濟低度發展的國家，其生育率與死亡率都很高，而且生育率很穩定，而死亡率則視自然及社會環境之變動，有很大的變化。後來由於糧食增加，工商業逐漸進步，社會組織之改進，醫藥知識與醫療設備之發達，死亡率開始持續的下降。過後不久，生育率又開始下降，雖然生育率與死亡率均下降，但是生育率之下降往往落與死亡率之後。最後，死亡率之下降達到一個極限，生育率已降至約與死亡率相等，於是緩和的人口成長現象再度出現。死亡率變成很穩定，而生育率則因個人之決定，每年常有波動。²¹

以鄧小平的人口理論的觀點來看，建國初期鄧小平就敏銳地看到低素質人口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阻礙作用，並在當時鼓勵人們生育、批判馬爾薩斯人口理論的歷史背景下，率先提出計劃生育。他指出：「人口多，耕地少 即使若干年後人口不再增加，人口多的問題在一段時間內仍然存在，」²²「現代化的生產只需要較少的人就夠了，而我們的人口這樣多」。²³

除了人口數量控制外，鄧小平一再強調提高人口素質的重要性。針

²¹ Coale Ansley J. and Edgar M. Hoover, "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Low-Income Countries: A Case Study of India's Prospects", Princeton, N.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 10-13.

²² 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頁149~150。

²³ 同上註。

對中國人口素質低的現狀，他指出：「我們常說，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這裡講的人，是指有一定的科學知識、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來使用工具、實現物質資料生產的人」。²⁴人沒有較高的素質就不可能推動生產力發達，也不可能在科學技術不斷發展的社會中實現就業，「我們就會長期面對著一個就業不充分的社會問題，這裡問題很多，」²⁵中國的富強取決於人口知識化，這是鄧小平的一貫思想。他指出：「我們國家，國力的強弱，經濟發展後勁的大小，越來越取決於知識份子的數量和品質。一個十億人口的大國，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資源的巨大優勢是任何一個國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優勢，再加上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我們的目標就有把握達到」。²⁶進入80年代中後期，中國人口的過快增長趨勢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中國人口轉變過程發生了新的變化，學術界也開始思考導致人口轉變的因素。

隨著中共改革開放、展開一胎化政策，導致了經濟發展。因此，中國人口結構已轉變成低出生率、低自然增長率、低死亡率的局面。這樣的在社會轉型中的人口轉變本身就意味著對資源需求的上升。對於中國這樣一個人均資源極為短缺的國家來說，在人口問題上應戒除盲目樂觀的態度，謹慎地處理好人口增長與轉型中的諸多問題，特別是人口與資源的緊張，就顯得特別重要。

三、獨生子女研究理論 (One-Child Policy Theory)

自從1979年中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獨生子女」就作為一種特殊的群體存在於中國社會中。從理論研究的角度看，對「獨生子女」

²⁴ 人民日報，「鄧小平會見多哥總理埃亞練馬時的講話」，1989年4月9日。

²⁵ 鄧小平，前揭書，頁150。

²⁶ 鄧小平，「把教育工作認真抓起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120。

的研究橫跨和佔據了多學科的研究領地，例如心理學、教育學、人口學和社會學等。已有許多學者對中國「獨生子女」研究的現狀進行過分析。由於認為「獨生子女」在早期生活中形成了人格、心理等方面的某些弱點，而第一批領取「獨生子女」證的「獨生子女」現在都已經是成年人了，他們開始面臨繼續升學、勞動就業、戀愛婚姻、社會交往等一系列社會適應的新任務。所以，人們擔心他們能否順利進入社會，現狀究竟如何？

有的人研究發現，進入青年期的「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之間有所差異，但不存在本質差異，並且有所差異所表現的積極方面構成了青年「獨生子女」的主流，但也存在四個問題：「獨生子女」的社會交往能力缺乏；職業適應能力較差 - 工作遇有矛盾，處理方法過於簡單，而且解決問題的能力相對差些；社會責任感較差；存在一定程度的高消費、超前消費傾向。（蘇頌興，1997）²⁷

前不久，Falbo, T. Polit, D.F (1986) 對1982年以來關於獨生子女的上百項研究進行了定量分析，研究發現獨生子女在適應能力和社交能力上與非獨生子女無異樣，但獨生子女與非頭胎子女存在著一定的差別，尤其是那些來自大家庭的非頭胎子女。不過差別僅在於學業成就及智力上，獨生子女優於非頭胎子女。²⁸

有關於「獨生子女」的教育問題研究這一方面是「獨生子女」研究的主體，主要涉及到家庭教育。由於「獨生子女」特殊的生活環境，即「獨生、獨門、獨戶」導致了家庭教育的某些缺陷，而理論假定一個孩子的成長受早期父母的家庭教育影響較大，所以「獨生子女」的家庭教育研究受到一些學者的重視。

²⁷ 蘇頌興，「青年期獨生子女的社會適應與家庭教育」，《當代青年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青少年研究所，1997年第一期，頁78-80。

²⁸ Falbo, T. Polit, D.F, "Quantitative review of the only child literature: Research evidence and theory developmen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100, 1986, 176-189.

一項對安徽、北京、甘肅和湖南四省、市聯合調查的發現，「獨生子女」家庭更具有其他學生不可比的優越條件，不僅家庭經濟收入較高，父母文化程度更高，而且教育方式更理性，家長對孩子學習關心和期望也遠遠超過其他學生家長。這些都是他們所處環境優越的一種表現。研究發現，環境優勢十分有助於獨生子女智力優勢的形成和發展，這種外部的客觀環境因素只有通過主觀努力才能起作用。相反，如果不正確利用優越的客觀條件，產生優越感，背上特殊階層的包袱，必然有害於獨生子女的健康成長。（解振明、顧寶昌，1996）²⁹

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在社會學中屬於初級社會群體範疇。因此可以認為，圍繞家庭的內部關係或外部結構等對「獨生子女」的種種影響的研究，都可歸屬於社會學角度的研究。有一些人調查發現，湖北省「獨生子女」家庭人口規模較小；家庭結構以兩代人為主；家長主要扮演孩子的「教師」和「夥伴」兩種角色。（風笑天，1997）

「獨生子女」社會化的經驗研究也佔有一半的比重，但主要是郝玉章、風笑天兩位學者的研究成果，他們一是從家庭、大眾傳播媒介對「獨生子女」社會化的影響著手，認為中學生「獨生子女」在社會化過程中受父母影響較大，同時受電視的影響也很大。從社會化的內容著手，他們發現「獨生子女」的社會交往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較強，但集體勞動觀念淡薄，追求高消費、超前消費，期望文化程度達到大專以上，職業期望主要是以腦力勞動、知識型勞動為特徵的專業技術工作。（風笑天，1996）³⁰

隨著「獨生子女」的成長及隊伍的壯大，「獨生子女」問題已經成為一個社會問題，涉及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因此，僅從心理學和教育學

²⁹ 解振明、顧寶昌，「中國獨生子女智力成長的環境優勢」，《中國獨生子女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96。

³⁰ 風笑天，「家庭與獨生子女社會化」，《中國獨生子女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167-179。

角度研究「獨生子女」問題是不夠的，還應該從社會學或人口學的角度去研究。從人口學角度研究「獨生子女」的也佔有一定的比例。有的學者還認為應該創建新的學科「獨生子女」學，來專門研究「獨生子女」問題。（蘇頌興，1997）

有關於獨生子女研究已有很多，從而發現「獨生子女」研究的主要內容就有兩大方面：一方面是「獨生子女」的人格、心理特徵研究；另一方面是「獨生子女」的家庭教育研究。主要研究方法為從微觀角度出發，在宏觀角度去探討「獨生子女」教育情況。但吾人認為，對於中國人口問題，重點應該放經驗研究以及主體研究方面，並結合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做出如何的政策回應等等。

四、適度人口理論(optimum population)

適度人口就是能夠達到一個特定或一系列目標的「最佳」或「最理想」的人口規模，這樣的人口可以獲得最大的經濟利益和社會福利。適度人口為探討一個國家最適宜人口的理論。適度人口舊譯為適中人口或時中人口，也可譯為最優人口。適度人口論起初探討最適宜的、最有利的人口數量、人口規模，後來也包括最適宜的人口密度、人口素質等。

31

坎南(Edwin Cannan)最早系統地分析了適度人口，創立了適度人口論。他把產業最大收益作為達到適度人口的標準，「在任何一定時期，或者在任何特定的條件下，或其他條件都保持不變，總有一個可以稱之為獲得產業最大收益的時點，此時人口數量剛好如此恰當地適應環境，以致無論人口是多於或少於此時的人口，其收益(或勞動生產率)都會下降(遞減)。這種人口則被定名為適度人口」。³²

³¹ 劉錚，《人口學辭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46。

³² 彭松建，《西方人口？？？概？》，北京：北京大？出版社，1987年，頁160。

維克塞爾(Knut Wecksell) 把邊際分析方法引進適度人口理論，認為適度人口是人口達到其數量稍許增加就會導致繁榮不再增加而是減少的那一點。「當人口增長時，兩種相反的力量會發生作用。一方面，當每個人所佔用的土地份額或一般性的自然資源變少時，勞動生產率便下降。另一方面，人類的共同努力、勞動分工與合作、產業組織等等總是非常重要的，在特定的重要情形下，可以征服自然力。在這兩種相反的力量正好相互抵消時，真正的適度人口便達到了」。³³

卡爾—桑德斯(A. M. Cars-saunders) 認為，確定適度人口數量的「唯一標準是經濟標準；可據此確定可取人數的唯一驗證是以每人平均收入為基礎的」。「我們認為一個國家整個人口的情況是經濟因素所制約的。如人口有所增長，我們認為這一增長會接近於經濟情況所需要的那種增長，以便取得每個人應有的最大收入」。³⁴即人口的變化與國民經濟變化相適應。他還提出了適度人口密度的概念，認為一個國家的人口在所支配範圍內，達到居民獲得最好生活水準的人口密度，或獲得最高生活水準的密度，即為適度人口密度。

現代適度人口論以阿爾弗雷·索維(Alfred Sauvy) 為代表。與早期的適度人口論相比，現代適度人口理論涉及的領域更寬泛，確定適度人口的標準趨於多元化，從靜態走向動態，使適度人口論更實用、更切合實際。索維探索在各種社會經濟條件下，人口數量與經濟變數之間的一種最適宜的關係，尋求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適宜關係。定義適度人口為「一個以最令人滿意的方式達到某項特定目標的人口」。³⁵既強調了目標，又關注達到目標的方式或途徑。認為目標有多少個，「適度」也相應地有多少個。他為適度人口設立了9 個目標：個人福利、福利總

³³ 彭松建，前揭書，頁169-172。

³⁴ 彭松建，前揭書，頁174-177。

³⁵ 阿爾弗雷·索維，《人口通論(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53。

和、財富增加、就業、實力、健康長壽、壽命總和、文化知識、居民人數等，可以根據不同的標準確定目標。在如何達到適度目標的途徑上，突破了早期適度人口思想單純提高人口適度規模的局限，主張從提高適度人口規模和適當控制人口增長兩方面，提高社會經濟系統對人口增長的適應能力。

這一時期的重要發展是把適度人口規模的研究延伸到適度人口增長率的領域。所謂適度人口規模是指一定國土範圍內的人口數量，對於獲得一定的最先進的目標(如最大人均收入)，可能太少，也可能太多，在太少和太多之間，總有一個既不太少又不太多的適度人口數量。而適度人口增長率是一個完全類似的概念，對達到既定的目標來說，人口增長可能太慢或者可能太快，總有一種既不是太慢又不是太快的適度人口增長率。³⁶ 按照索維的思想，人口增長會給社會和家庭帶來一定的負擔，同時，也會帶來一定的經濟效益，可以從人口增長的負擔和效益之間尋找均衡點，以這一均衡點來確定適度人口增長率。³⁷ 適度人口增長率不是一成不變的，不能把適度人口增長率歸結為選擇一種永恆不變的適度增長率。³⁸ 影響適度人口的因素不僅僅是經濟，還包括技術進步與生產率提高，技術進步可以使最高人口與生活水準都有所提高，因為通過技術進步人們可以生產更多的產品，再加上合理的分配和必要的社會協作，就可以養活更多的人口，還可以提高適度人口規模。³⁹

田雪原(1982)從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出發，探討實現適度人口的途徑和實際意義。筆者認為，從中國土地和資源出發，根據未來經濟發展可能達到的速度和水準來研究中國適度人口數量，這既是一個理論問

³⁶ 彭松建，前揭書，頁443-453。

³⁷ 同上註。

³⁸ 同上註。

³⁹ 原新，「可持續適度人口的理論構想」，《人口與經濟》，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1999年第四期，頁35。

題，也是一個現實問題，它關係到百年後我們的子孫後代在什麼樣的環境中生活。通過對未來 100 年內的固定資產增長速度和勞動者技術裝備提高的速度，生產性固定資產、勞動者技術裝備程度和工農業勞動者三者比例關係，和基於工農業勞動者數量推算總人口三個方面，可以推算，中國 100 年後的適度人口數量應穩定在 6.5 億至 7 億之間。⁴⁰在借鑒西方適度人口理論的基礎上，學界根據中國政治體制的特點提出了最優人口的概念，即最優人口是過剩人口和過少人口之間的臨界點上的人口，超過這個臨界點的則是過剩人口，低於這個臨界點的便是過少人口，而且這個臨界點是動態的、有彈性的、有幅度的。同時，社會主義最優人口增長率的概念也應運而生，這對後來學界關於適度人口的研究有著非常重要的學術價值。⁴¹

總而言之，適度人口理論則指出了人口發展的重要方向，為人口問題的解決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解決方案。人口理論的發展將跟隨時代的脈動而不斷改變，無法用單一理論加以詮釋現狀，唯有結合各理論內涵與國家社會、經濟等影響因素，方能提出合適的人口理論。

⁴⁰ 田雪原，《新時期人口論》，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179。

⁴¹ 陸傑華，「中國人口與經濟關係問題研究」，《人口與經濟》，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1999年第6期，頁3-9。